

●李家寿

中国最早纸币——“交子”产生的原因及其年代

(一)

中国最早的纸币产生于宋代(公元960—1279),这是由于当时多种经济政治原因所促成的。一是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与之对应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客观上需要更多更轻便的货币,以利于商人们外出携带和交换。而中国自殷周以来,一直使用金属货币,主要是铜钱。历经五代十国战乱后建立的宋朝,铜矿业、铸钱业受到破坏,交换媒介的铜钱严重不足,某些地区甚至还流行值小体重、购买力又低的铁钱,大的铁钱每千钱竟重达二十五斤。货币流通中的这种情况对于携钱外出做大宗买卖的商人们来说就很不方便了。二是宋代在中国历代皇朝中是一个较弱的朝代,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先是辽国、后是金国)的威胁和侵略。因此,建国以来军费开支一直十分庞大,财政非常困难,靠发行一些成本高、面值小的铜钱、铁钱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三是中国自五代十国以来,与分裂的政治局面相对应,也形成了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以防铜钱外流。宋成立以来,这种货币流通领域中割据的局面也没有得到纠正。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就应运而生了。但交子的产生最早并非由政府发一道命令而开始印制发行,它是首先由民间自发产生。因此,它产生的确切年代也就颇费思量了。在治中国货币史的中外学者中也各有不同的说法。关于交子的产生,从现有史料来看有如下几条:

《续资治通鉴长编》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二月庚辰条:“自李顺作乱……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同上书,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十一月癸卯条:“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公元1016年)薛田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诏从所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宋史·席旦传》:“蜀用铁钱,以其难于转移,故权以楮券(按:楮即纸。纸券即指交子)。”

有关交子产生的时间和地点,材料上仅说“李顺作乱”。关于李顺的情况,据历史记载,李系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春,与王小波一起在川峡地区进行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宋淳化四年十二月,即公元994年2月王小波在江原(今四川崇春东南)与宋军作战负伤后牺牲,李顺即被起义军继推为领袖。次年兵败后被杀。余部在张余领导下继续斗争了一个时期。宋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起义军失败。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王小波或李顺均系四川茶贩出身,也就是说他们最初的职业均是从事茶叶的贩运和买卖工作的。他们起义的时间是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春,到宋至道元年(公元995)。

从以上几条有关交子的材料和“李顺作乱”的考证中可以看出：第一，交子首先产生于中国四川地区的民间，纯粹是为了代替笨重的铁钱流通。第二，到公元1023年以前，四川民间的交子已发展到由十几家富商联合发行的制度。第三，在天圣元年（公元1023）宋政府开始设置益州交子务，纸币的发行业务由民间改为官办。

（二）

交子的“交”是交合的意思。指两张券合得起来就交钱。早期的交子是一张两面都有发行人印记（即图章）的纸，领用者交来多少钱，即开给他多少数目的交子，交子的格式并不统一，票面金额也是临时填写的，最后加上密码花押即算完成。后来富商们联合发行交子时，为防止假冒，除先前的密码、花押、印记外，还在纸质的交子上加印了图案。金额也是临时应领用人的申请填写，不限多少，只要交付现钱，便发给交子。随时可以兑现。但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三十文。所以交子是一种兑换券性质的纸币。又轻又薄的纸质交子当钱使用，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后来交子发行由民间改为官办，发行的官交子有一定的发行限额和流通期限。每界发行限额为1256340缗（按：一千文为一缗）。大抵是三年为一界，界满后持旧交子换新交子，大凡每造一界，应备本钱（即发行准备金）三十六万缗。当时交子的行使区仅限于四川，兑现时或持旧易新时，每贯仍需纳工墨费三十文。后来随着没有准备金的财政性发行，使交子的流通扩及至四川以外的地方。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把交子改称为“钱引”。同时在中国其他地方受四川交子影响也产生过性质类同的“关子”、“会子”、“湖会”、“淮交”（按：会子盛行于中国东南各地；湖会流行于湖北、湖南；淮交流行于两淮的州县）。从它们的用途和交、关、会三字的字义相近看，毫无疑问，和四川地区的交子一样，都是中国最早的纸币。

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南宋统治区内，会子最为通行。会子原来也起源于民间，从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会子改由政府发行，次年设“行在会子务”。会子的发行制度比以前的纸币进步，以前金额是临时填写的，而会子的金额却印在上面，并有发行机关。为预防伪造，在它的上面突出地印着“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等字样，以事前对企图伪造纸币的人起到阻吓作用。

（三）

至于交子产生的年代是不是可以说是与王小波、李顺起义军（公元993—995年）的时间相一致呢？按现有材料来看也是可以的，但这里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交子是起源于民间的，凡民间产生的东西总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它不可能是哪一天或哪一年突然产生的，这正象中国文字的起源一样，有一个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仓颉造字”之类仅仅是神话和传说而已）。所以不能把上面所引述的材料机械地理解为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就在“李顺作乱”的公元993—995年这一时期。二是“李顺作乱”中的两位起义军领袖人物均系四川茶贩出身，起义军的基本队伍也是四川的茶农和“旁农”（即佃农）。四川在历史上以盛产专销边疆少数民族的“边茶”而著称，王、李两位在起义前又是以茶叶的运销买卖为业的，所以深知茶叶在贩卖邻省或边疆中使用值小量重的铁钱如何之不便，而使用民间所创造的又轻又薄的纸质交子的便利。于是在起义的过程中很可能对交子在四川地区的使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后来的统治阶级及其史人们在记录历史时就吧起源于民间的交子与“李

顺作乱”这件事联系上了。另外，公元1016年转运使薛田奏请朝廷设“交子务”，拟把盛行于民间的交子发行业务改为官办时，统治阶级大概也因为交子流行之事和“李顺作乱”挂上了钩，所以迟迟不愿批准，整整拖了七年。直到公元1023年，才勉强同意所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根据以上认识，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应该在宋初(公元960年)前后。随着宋王朝的建立，中国政治经济有了一个相对的稳定和发展的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四川地区民间深感笨重的铁钱在商品交换的使用中极为不便，于是纸质货币的交子在四川民间逐渐流行。到公元993—995年王小波、李顺等农民起义的兴起，对交子在四川的流行又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又由于民间私人发行的交子往往信用不足，引起“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于是由富商大户们联合起来发行交子，以扩大信用。但在商品经济中谁也不可能永远是富户，因此，只要某个富户“资稍衰，不能偿所负”，就会引起“争讼数起”。所以到后来，即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由宋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完全由官方来办理交子的发行业务了。

四川交子从民间流行到正式由宋政府设立官方机构来进行发行，从宋初(公元960)到天圣之年(公元1023)整整花了六十余年。这不但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大事，而且也是世界货币史上的大事。因为在使用纸币方面，欧洲要比中国晚了几百年。当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约公元1254—1324)于1275年来到中国，见到一张小小的“中统钞”(系元朝学习宋朝的办法于中统元年，即公元1260年所发行的纸币)能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时竟大为赞叹和羡慕。这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上接第8页)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需要构成此系统的几个环节同时改革，才能获得成功。其他环节不动，只改一个环节，不是白费力气，就是事倍功半。我们过去只着眼于企业这个环节的改革，并且发生了股份制好还是承包制好的长期争论。其实，孤立地进行企业制度改革，不论是搞股份制还是搞承包制，都很难摆脱行政干预，很难实行经营机制转换。要实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必须改变企业的产权制度；要改变企业的产权制度，又不能只在企业这个环节上做文章，而必须同时在上述的另两个环节上做文章。从改革的难度上看，我认为第一环节上的改革难度最大，其次是第二环节，再次是第三环节。因为第一环节上的改革会碰到利益障碍，第二和第三环节的改革主要是技术上障碍。从“先易后难”的原则上讲，可以先改第三环节。但从功利角度上看，第一、第二环节不动，第三环节的改革必然收效不大。因此我认为，在企业制度改革上需要调整思路，不能就事论事地只在第三环节上动脑筋，而应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上。这样做，第三环节上的改革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成功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自然也就完成了。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成功之时，就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完成之日。